

生活·情感·艺术

阿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生活·情感·艺术

段更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5 号

生活·情感·艺术

SHENGHUO · QINGGAN · YISHU

段更新 著

责任编辑：王 我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3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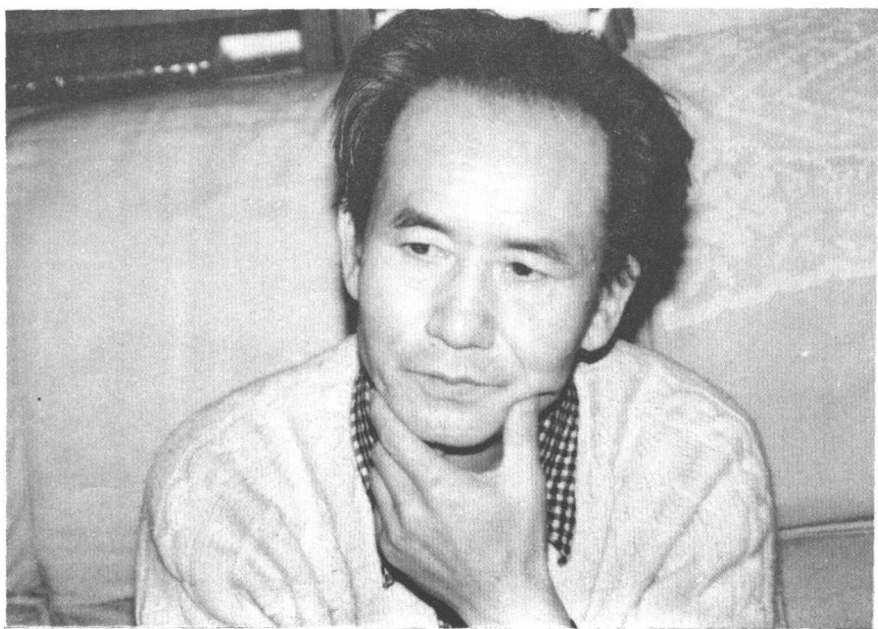
210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500 册

定价：6.50 元



王勃

一九四〇年生，吉林省德惠县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多年，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在新闻出版报社工作。

目 录

贯彻“双百”方针，实行艺术民主·····	1
“不要粉饰现实，而要看到它的明天”	
——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与作家的生活观点浅识·····	12
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行艺术探索·····	27
略谈近年文学创作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34
个人感受与时代情绪·····	40
通俗文学与欣赏趣味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49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	58
论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兼评“表象——概念——表象”的创作公式·····	82
论感情在文艺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	105
论艺术幻象·····	137
谈艺术感觉·····	158
简论艺术的隐性·····	169
悲剧命运，英雄性格	
——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	174
呼唤美好的人性	
——评中篇小说《五三四号征婚人》·····	190

站在祖国、人民、时代面前	
——关于一九八一年报告文学的报告·····	195
我读《光明树》	
——兼谈儿童文学的故事性和想象力·····	219
诗路通向人生	
——黄淮《人之诗》放谈·····	227
诗有别材·····	233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漫谈故事影片《人到中年》·····	237
一种正义的社会姿态	
——评讽刺喜剧影片《死去活来》·····	249
人生种种真况味	
——历史昆剧《南唐遗事》观读感言·····	255
唤起心灵的向善感	
——评剧现代戏《野马》观后·····	266
让文学理论更可读可解	
——《文学的艺术技巧》读后琐议·····	269
一笺讯息，一颗硕果	
——评介《文艺美学辞典》·····	273
明朗的心灵，清爽的文思	
——序《香罗情仇》·····	278
俯视苦难	
——关于《寻找到的脚印》的一封信·····	286
后记·····	291

贯彻“双百”方针，实行艺术民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现在，我国正处在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将发生巨大的革命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坚定地执行“双百”方针，实行艺术民主，使文艺迅速繁荣起来，适应现实生活前进的步伐，为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同志曾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直接表述为“放”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因此，“双百”方针，也就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方针。在文学艺术事业中，则是要在人民内部

实行艺术民主。早在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文艺，同样是民主的文艺。

在我们国家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还没有消除，作为脑力劳动者的作家、艺术家，是艺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文艺上实行“放”的方针，就是要给予作家、艺术家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广开思路、广开才路、广开言路，使他们自由地进行艺术实践，运用文艺的形式发表对生活的看法和意见。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受到国家的保护。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把“双百”方针写进了总纲，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内容，这对于实行艺术民主，繁荣文艺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驳“舆论一律”》）同样地，作家、艺术家以文艺的形式肯定和歌颂生活中正确的、革命的事物，揭露和批判生活中落后的、反动的事物，包括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他们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压制这种权利，是党和国家所不允许的。即使发表的意见和看法不够全面，不够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也只能通过民主的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去解决，通过艺术实践去加以纠正和解决，而决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文艺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要求艺术的笔锋不断探索新的生活领域，不断占领新的认识境界。因此，在文艺创作中错误是难免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要求尽量少犯错误，特别要尽力避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犯了错误，就要改正，改正得愈快愈好。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艺术民主，用棍棒

政策代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艺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稍有不合，轻则棍棒交加，重则伤生害命，甚至祸灭九族，殃及乡里。毛泽东同志曾严厉斥责四人帮的棍棒政策：“别人不能提意见”，“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从反面告诉我们，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发表错误意见，允许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意见，是贯彻“放”的方针，实行艺术民主的重要问题。反之，不准犯错误，有一点错误就抓住辫子一棍子打死，这无异于箝制言论，把“放”的方针变成了“收”的方针，把艺术民主变成了艺术独裁。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一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宁“左”勿右的错误作法指出：“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周恩来同志在这个著名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在文艺界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前，文艺工作者刚刚从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有的还心有余悸，迈不开艺术实践的双脚，这对于繁荣文艺极为不利。他们心有余悸，不只是怕犯错误，因为错误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免的；而主要是在于怕犯了错误就被一棍子打死。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把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党的文艺政策彻底调整过来，取缔他们的棍子政策，坚决贯彻“放”的方针，实行艺术民主。

贯彻“放”的方针，实行艺术民主，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放”的方针只把艺术民主的权利给予人民，而不给予人

民的敌人。但是，反革命的言论有时并不以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以种种伪装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出来，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因此，随之就有一个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六项政治标准，是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标准。香花和毒草，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在人民内部，也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也有毒草，按其性质来说，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不应该把所有的毒草都当作敌我矛盾。区分香花与毒草需要十分谨慎，必须严格地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六项政治标准，防止把艺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对精神世界的问题要特别慎重。究竟一部作品是不是毒草，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文艺创作中的艺术问题，决不是一纸政治结论和行政命令所能奏效的，应当通过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实践去解决。

二

贯彻“放”的方针，实行艺术民主，必须解放作家、艺术家的思想，使他们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大胆地自由地进行创作。

文艺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思想是否解放与创作能否繁荣，是密切相关的。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表明，凡是文艺繁荣的时期，往往是思想活跃的时期；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必定

是一定历史时期思想解放的闯将。如果没有“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兴起；没有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们，对当时还是横行霸道的四人帮的英勇挑战，就不会有千古一时、感天动地的《天安门诗抄》。相反，四人帮治下的文艺，除了一批阴谋文艺作品外，公式化、概念化的僵死的文艺作品泛滥成灾，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是他们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造成的。与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的沉闷状况相反，在四害除后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出现了《丹心谱》、《班主任》、《于无声处》等一批真实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意愿，深刻揭示生活本质的优秀文艺作品，正是由于党中央号召理论联系实际，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极大地解放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的结果。尽管这样的作品还不是很多，但它们却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已经露出了端倪。可见，思想解放促进文艺繁荣，是文艺创作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表现。

解放思想，要坚持文艺创作从生活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反对一切主观主义地对文艺创作划禁区、下禁令。林彪、四人帮对文艺创作划地为牢、设置禁区，成文地或不成文地规定：生活中的悲剧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牺牲不能写，战争造成的灾难不能写，落后的和中间状态的人物的转变不能写，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写，无产阶级的骨肉之情、男女之爱、同志之谊统统不能写，此类清规戒律，擢发难数。那时候，要写什么，不写什么，不能从生活实际出发，不能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只能从他们的好恶出发。

文艺创作只能从生活出发，这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艺术创作上的具体运用，也是工农兵方向所要求的。这个原则表现在创作题材问题上，就是使题材多样化，以写现代革命题材为

主，特别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也要重视历史题材和其它题材。作家、艺术家要解放思想，就要坚持从生活出发，突破林彪、四人帮在题材问题上所设置的种种禁区，自由地选取题材，自由地进行创作。

列宁在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在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同时，曾强调指出：“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这两个“无可争论”的指示，是针对文艺的特点谈的，但其中已经包括作家、艺术家有选择题材的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思想。列宁认为正是党的文学才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学。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决不是单调的、贫乏的，而是多方面的、丰富的。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规模的扩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既不是七十多年前俄国的劳动人民所能相比的，也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工农兵所能相比的。他们对于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的要求更高了，也更广泛了。可见，作家、艺术家自由选取题材、自由进行创作，并不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相抵触的。恰恰相反，正是今天文艺的服务对象的新变化，才为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提供了无比宽广的用武之地，才为他们提供了“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般的创作自由。

毛泽东同志曾经满怀激情地号召文艺工作者：“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

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这五个“一切”，同样肯定了作家、艺术家有选取题材和创作的充分自由。

毫无疑问，我们的文艺应该努力描写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战斗生活，塑造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然而无比丰富的现实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其广泛的生活素材，为满足工农兵正当的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不仅先进人物可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可以写，落后状态的人物也可以写，阶级敌人及其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和灾难也可以写，正如高尔基所说的，甚至连“英雄变成奴才的过程”也是可以写的，因为“这个过程在我们这动荡的时代也是‘有存在地位’的”。（《论文学》第14页）难道这种事例，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吗？难道这种事例，对于广大群众认识现实的阶级斗争没有教益吗？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在创作题材上，就不应受任何限制。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深入生活，拿出现实生活的事实和工农兵需要的事实，才能最后把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一切空言、废话、咒语和禁区打得粉碎。

解放思想，首先要求各级文化部门、文艺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解放思想。不要层层设防，处处设卡。要大胆地贯彻“放”的方针，而不要一味消极地防范，这是问题的关键。有的同志看了几篇揭露林彪、四人帮罪恶的文艺作品，认为这是“暴露文学”，表示种种担心和疑虑。应该说，目前整个文艺创作的主流是好的；一些揭露林彪、四人帮罪恶的文艺作品，主流也是好的。它们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提出了广大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正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个别作品感情不够健康，情趣不是很高，通过文艺界正常的自由讨论，是可以解决的，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应该相信，广大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好的，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特别是经过粉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锻炼，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生活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大胆地自由地进行文艺创作。

三

贯彻“放”的方针，实际艺术民主，实际上是一个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问题。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形态，区别于其它观念形态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通过形象思维，以形象的方式而不是以理论的方式反映生活的。周恩来同志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形象思维是人们对生活的“艺术掌握”，固然它也要遵循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但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在对生活进行概括时，是在不离开具体的、个别的形象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更加具有幻想和感情的特征，它的任务就是要把生活中具体的、个别的形象的共同本质抽取出来，集中起来，以典型的也就是更高级的个性化的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质。艺术形象的创造，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既有客观生活的根据，又是借助作者想象虚构的。而以艺术形象构成的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产物，从个体上说，必然要有个人的独创性，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总体上说，必然要有多样性，否则也就取消了个人独创性。文艺作品正是以自己不同的题材、体裁、风格、样式，反映着无限广阔、变化

无穷的现实生活，适应着千百万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就文艺的这种特殊性来说，它更需要民主与自由，最容不得机械划一，武断专横。

过分夸大文艺的特殊性，以为这种认识工具可以脱离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因而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一般宇宙观的指导；以为它可以脱离党的领导，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忽视文艺的特殊性，以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仅包括，而且可以代替文艺的创作论；以为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可以不顾文艺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规律，同样是错误的。

正是基于对文艺基本特征的认识，马克思怒斥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说：“给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并以不能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作譬，严正地指出，文艺作为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的精神的产物，决不应该限定“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第7页）基于同样的认识，正如我们上面引述的那样，列宁在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同时，用“无可争论”、“绝对必须”这样的加强语式指出，要保证作家、艺术家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思想和幻想，以及选择形式和内容的自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一九五一年四月，毛泽东同志作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著名题词。随后于一九五七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

同志的这些指示，不仅充分肯定和估价了文艺的个人独创性和多样化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把文艺的特点放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的基础上加以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上创造性地指出了文艺发展的规律，就是文艺自身的不同内容和形式之间的比较和竞赛、矛盾和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放”的方针之所以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唯一正确的方针，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艺术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不断地从文学艺术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提供了指导的线索。而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发扬艺术民主，正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

四人帮无视文艺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规律，把用行政力量解决艺术问题的作法，推展到了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极致。他们以至高无上的艺术裁判官的架势，强制推行“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及一整套“样板”经，强制推行“艺术一律”的政策，对文艺创作的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等方面严加限制。他们不仅一般地使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观点，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观点，而且还要对那些主张不合“帮”意的风格和观点的人，动用专政手段予以制裁和镇压。在他们独霸文艺界领导权时，有多少人为探讨一个文艺理论问题，为探索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为实践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被剥夺从事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权利，被剥夺政治生命，被抄、被抓、甚至被置之死地！真是文网恢恢，疏而不漏，造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四人帮践踏文艺规律，必然要受到惩罚。在四害横行时，文艺已濒临绝境，创作已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是在民主的土地上、自由的空气中生长的。只要我们坚定地执行“双百”方针，按照艺术规律办

事，敢于解放思想，敢于实行艺术民主，更加繁荣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就一定会到来。

（载《红旗》1979年第2期）